

「前隱逸」與「後仕宦」的視野遞換 ——陶淵明宦遊主題中出處記憶的造現

葉 常 泓*

摘 要

陶淵明（365?-427）於壯年十餘載間嘗經「三出四處」之跌宕，而其以宦遊為主題或明確涉及宦遊的詩賦，今存十一。此諸作品，再現了陶淵明透過若干詭譎多層的修飾技巧、傳播策略及意義建構，而重新編輯、變造的出處記憶。在標示撰於宦遊途中的作品裡，陶淵明立足於「前隱逸」的視野而描述宦遊、追念歸田，以經過正面化變造程序的退處記憶，去評估當下的仕宦經驗。在標示撰於歸田期間的作品裡，則遞換為立足於「後仕宦」的視野而記敘歸田、回憶宦遊，以經過負面化變造程序的宦遊記憶，去檢定現有的退處經驗。至於在非出非處的間歇中所撰者，「前隱逸」與「後仕宦」的視野則摺疊共存，且有所調停及消解。考諸歷來陶淵明研究，「記憶如何被書寫」是一個未獲充份釐析的問題。然而，藉由揭示作者化合了原始生動的經驗、記憶，以及狀似原始生動的「經驗」口吻和「記憶」語態，從而形成的「記憶書寫」，我們將得以察見陶淵明如何一再辯解、修飾、平衡其「三出四處」的遊移和不一致，聲明個人向百代隱逸譜系歸位的趨同性，並引導史家與讀者肯認其歸田意志；其次，亦將得以呈顯其較少被後世精讀的宦遊詩和最為人稱頌的田園詩之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yapchanghoong@gmail.com）

投稿日期：100.09.26；接受刊登日期：101.01.10；最後修訂日期：101.01.17

間，實存在著意蘊上的重合與理路上的鏈接；最後，則得以修正傳統史家及評論者視陶淵明毫無出處矛盾的「經典化」認知。

關鍵詞：陶淵明、記憶、宦遊、前隱逸、後仕宦、出處

**The Shift in The Vision of
“Pre-reclusion” and “Post-officialdom”
—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Memories in
Tao YuanMing’s Creations on the
Theme of Official travel**

Chang-hoong Yap*

Abstrac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in his middle age, Tao YuanMing served the government and withdrew from posts as much as three to four times, and he left eleven works on the theme of official travel (“Huan You”) during this specific period. By adopting complicated and delicate artifices and strategies, Tao compiled, transformed and rewrote his memories of official travels and withdrawals in these works. I put forth two key conceptions, namely the vision of “Pre-reclusion” and the vision of “Post-officialdom”, so as to expound how Tao represent his memories in poems or rhapsody. In particular works with marks of being written on the way of official travels, Tao composed these on the basis of the vision of “Pre-reclusion” as he depicted the travel and evoked his former or future pastoral career. The present official experience was devalued in the light of his positively transformed memories

* Doct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r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ceived September 26, 2011; accepted January 10, 2012; last revised January 17, 2012

of withdrawal. On the contrary, in other works with marks of being written after Tao returned to his farmland and homeland, he shifted the former vision to so-called “Post-official” one, as he looked back to his previous stages of official services and travels. Contrasting with his negatively transformed memories of holding office, the present withdrawn life was evaluated and elevated. As for the work written on the specific moment of non-engagement and non-disengagement, the vision of “Pre-reclusion” and “Post-official” had been mixed together, they existed simultaneously and was even reconciled. So far “how the memories were written” is a problem that calls for sufficient analysis in the research of Tao YuanMing. Thus, by revealing a succession of Tao’s “memorial writings” which were disguised as original and authentic experiences or memories, we can penetrate how Tao modifies and explains repeatedly his wavering between serving the government and living as a farmer and recluse, how he make public statement, over and over again, about his disposition and similarity to those recluses in history. All these actions were done with the purpose of convincing the historians and readers to believe in his earnest volition to withdraw. Secondly, we can find the link and overlap between his works on the theme of official travel and other works on the theme of field and garden. At last, by way of tracing back to the reason of how the canonical image of Tao is to be shaped, we can amend some perceptions of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nd critics who deemed Tao as a pure, free from contradiction, and extraordinary exemplar of reclusion.

Keywords: Tao YuanMing, memory, official travel, pre-reclusion, post-officialdom, government service

壹、緒說：當「三出四處」的經驗編易記憶與書寫

對於個人生涯中所有重要的行止、遭遇和書寫，陶淵明（365?-427）雖未逐一自注年月與完整細節，但根據其子遺的若干線證、同時代人的載述（如顏延之〔384-456〕〈陶徵士誄〉），以及後世陶淵明傳記年譜撰者的反覆考榷，則陶淵明約於「向立年」近三十歲起任江州祭酒，迄晉安帝義熙元年乙巳歲（405）辭彭澤令而終不再仕，此十餘年內¹，又中經自解歸、辭辟、丁憂、起復、轉除，斷斷續續，時出時處，遠較六朝一般弱冠干祿的士族子弟晚仕而早退。在江州祭酒與江州彭澤縣令之間，陶淵明尚嘗仕三職，歷次的服事對象、位份及任所亦略無疑義，惟一如其始末兩職，任期均不久長，依序應為桓玄（369-404）幕僚（荊州江陵）、鎮軍將軍劉裕（363-422）參軍（徐州京口）及建威將軍劉敬宣（?-415）參軍（江州潯陽）。在此「三出四處」的跌宕中，陶淵明至少傳下了以宦遊為主題或明確涉及宦遊經歷之作凡十一，且其中五詩，已於標題點明撰於宦遊途中，即〈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及〈乙巳歲三月為

¹ 參梁·沈約《宋書·隱逸傳》、蕭統〈陶淵明傳〉、唐·房玄齡等《晉書·隱逸傳》、李延壽《南史·隱逸傳》、南宋·王質〈栗里譜〉、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清·丁晏〈陶靖節年譜〉、楊希閔〈陶靖節年譜〉、近人梁啟超〈陶淵明年譜〉、傅東華〈陶淵明年譜〉、古直〈陶靖節年譜〉、遂欽立〈陶淵明年譜稿〉、楊勇《陶淵明年譜彙訂》等。陶淵明年壽，古今爭訟，有五十餘、六十餘、七十餘等說，但就其仕途起訖之繫年，諸家則不無共識。合觀《宋書·隱逸傳》載其「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及陶淵明〈飲酒〉其十九自云「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諸家大抵同意「向立年」乃將屆《論語·為政》所謂「三十而立」之齡。另據陶淵明辭彭澤令而終不復仕時所撰〈歸去來兮辭〉自序，明標解印去職時值「乙巳歲十一月」，即晉安帝義熙元年，然因生年成謎，諸家就是歲其春秋幾何仍有爭議，惟較常為人採信者乃四十一歲之說。如是，由四十一歲反推「向立年」，則陶淵明身涉官場凡十餘載。

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²另〈雜詩〉其九、十及十一³，胥詠行役之思，是故楊勇(1929-2008)、王叔岷(1914-2008)、王國瓊、齊益壽、袁行霈等學者皆以其宜屬宦遊主題。王國瓊先生復指出，依〈飲酒二十首〉其十及十九⁴內容，兼以〈飲酒〉自序「余閒居寡歡，……輒題數句自娛」為證，應即陶淵明歸田後憶述宦遊之作。⁵此外，既論宦遊，亦不可不提陶淵明撰於辭彭澤令而將歸之際的〈歸去來兮辭〉。⁶上述十一篇作品，補充了外沿史料如顏延之〈陶徵士誄〉、蕭統(501-531)〈陶淵明傳〉以及《晉書》、《宋書》、《南史》之〈隱逸傳〉等的不足，有裨於後人釐清陶淵明仕宦履歷之梗概。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明確意識地為個人由官場而逐漸向田園引退的身心歷程，留下較完整文字／文學記錄的「古今隱逸詩人之宗」⁷，陶淵明的詩文在傳統的文史批評者看來，格外具有「證辭」與「範例」

²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3，頁187、191-192、193-194、180、210。下引詩俱出此卷諸頁，不另贅注。

³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4，頁356、358、361。

⁴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3，頁258、279。

⁵ 諸說論證詳贍，不及備引，分見楊勇，《陶淵明年譜彙訂》，《新亞學報》，卷7期1抽印本(1965年)，頁268；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431、433；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頁339、358、360、362；齊益壽，〈陶淵明的宦遊詩〉，收入於《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臺北：幼獅出版社，1987年)，頁208-211；王國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出版社，2009年)，頁51-52、57-61、65、71。

⁶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5，頁460-461。

⁷ 梁·鍾嶸著，汪中注，《詩品注》(臺北：正中書局，1967年)，卷中，頁156。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亦以陶淵明有意蒐集並詮釋個人的生活資料，故可謂中國第一位嚴格意義上的「自傳詩人」。見 Stephen Owen, "The Self's Perfect Mirror: Poetry as Autobiography," in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ed. Sheun-fu Lin and Stephen Ow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74-88.

的意義：對陶淵明及其作品之詮釋，一方面經常被比附於晉宋鼎革之際的政治事件，另一方面亦處處遷就於正史名傳中毫無出處矛盾、正典化的隱逸形象。歷代以來，這類力求考竟原委、文史互證的論調，實未論證出陶淵明在人格或書寫上可能的複雜構造；相反地，它們嘗試盡量壓縮詮釋的歧義空間。按其說，對亂世政治及利祿功名的捐棄，成了陶淵明撰述的必然背景或動因；而陶淵明的詩文，又被均質化（homogenize）⁸為作者始終不願向亂世政治及利祿功名妥協之例證。顯然，「知人論世」、「變正美刺」等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傳統的邏輯於此一再生效，批評家既引用歷史背景「對本文所談及的主題進行了解」，亦引用本文去「探明本文以外的某些事情」，如是輾轉於「批評的循環」（the critical circle）。⁹文學書寫遂因此等同於「背景刺激—反映背景」的簡單反應物，或是（個人或集體）歷史事件之忠實攝象，無論該事件如何發生，甚或在根本上有否發生、是否和文學一樣同屬某種論述（discourse），總之被寫就的詩文，都成了「歷史」或「真實」的權威載體。彷彿後人祇需努力來回巡曳，便能從作品到作者再到經驗（前提是假定某經驗存在）之間，尋獲

⁸ 均質化亦即「去背景化」（decontextualize），乃相對於「歷史化」（historicize）而言。這種含有排斥性（exclusion）的詮釋態度常伴隨著正典構成（canon formation）的進程，它完全不考慮文本所處的複雜歷史語境，或祇選擇相信某單一（而不無後設）的歷史語境，以確立方便於群體接受的「超越性」答案。參 John Guillory, “Canon,” 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233-249。表面上，傳統批評者十分重視陶氏的時空背景，實質上卻已過猶不及，轉化成尼采所謂「歷史的濫用」（the abuse of history，參尼采著，陳濤譯，《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為一旦脫離「背景」必然的、規定的支撐，陶作的意義便無法均勻統一地解釋，甚至無法成立，更遑論流通於普世。然而，如此否定每個文學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給自足性、創造力，以及作家難以被集體「背景」化約的主體性，未嘗不是另一種反歷史的「去背景化」，真正妨礙了作品因多重解讀而方得以延續的生命力。

⁹ 霍伊（D.C. Hoy）著，蘭金仁譯，《批評的循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87、190。

一條暢達無阻的接受通路（前提也是假定此通路存在）：作者必然受某歷史經驗影響，而作品則反射乃至複現了此經驗，從而證明其實有。當整個文學文本被明挪暗借為歷史文本，那麼歷史便不再僅僅是包含於文學文本內的其中一種潛語（sub-text）、其中一種詮釋前提或指涉方向，而是壟斷了文本的意圖，佔居意義與價值的源頭，將閱讀導入歷史之專制。至若既存於文本中詭譎多變的文學語言技巧和審美感悟，雖然仍對歷史起著修飾、象徵與再現的作用，卻都被存而不論、視若無睹了。

在上述的批評觀中，還隱藏了一項我們必須重新質疑與限定的重要預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記憶能夠不失真地放映原始事件與經驗、而書寫又能夠成為盡致入微的記憶拓本？實際上，早有不少研究者分別由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史學及文學等角度提出了相當一致的發現，即基於生理上記憶容量的先天限制、心理上的特定需求，以及傳統、環境、集體關係等客觀條件的約束與誘導，故記憶機制在保存部份經驗與事實之前，便已篩汰乃至結構性的遺忘（structural amnesia）了其餘部份，並且對已保存者不無變動，包括生造從未發生過的「經驗」與「事實」。進一步地說，當書寫在陳述記憶中的經驗時，依重現媒介及目的之不同，無疑又是另一層次的剝瀆、增補、形質兩變。¹⁰因此，經驗—記憶—書寫，後者可能次第地為前者提供貯放、重現和理解的框架，卻也同時是截裂前者而致其流失的渠道。史傳之筆如是，詩文之筆亦如是，在層層轉化之後，筆下的內容早已不能完全代表真實事件和經驗本身，而往往祇是

¹⁰ 哈拉爾德·威爾策（Harald Welzer）編，季斌等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著，肖聿譯，《材料與記憶》（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Allan Megill,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對昔日所歷及其記憶的現時追憶、理解與闡說。特別是當經驗與記憶一旦匯入講求語言技巧和主觀感受的文學書寫，更意味著它將接受某種編輯翻譯的程序：一切重新拆卸，重新組構，無法排除創造性的詮釋，並且攸關修辭方式的抉擇。這也正顯示了文學文本呈現事物時特有的「一連串移位（displacement）」——整個文化（包括學術、政治、經濟、地理、傳統習俗、族群心態等方面）固然在某種程度上滲透了作者的生命，但它也深受作者之稟賦、性格、具體創作時微妙的心境變化所扭曲，而後才「在本文中留下極其含糊的印跡」¹¹。

有鑑於此，陶淵明——或任何人在心智中能夠回想起的經驗，以至於其人在文字載體及文學形式中所呈顯的記憶，都不可能是原真的、完整的、精準的事實。我們能觀測的，永遠祇是陶淵明選擇在書寫中透露、不排斥被讀者識知的某種「經驗」或「記憶」。嚴格地說，我們甚至不可能從具體的層次上，論證「陶淵明身心」是「如何經驗」又「如何記憶」三出四處的，而祇能分析「陶淵明作品」是如何變造性地呈現了作者樂意對外開放，且召喚特定解讀的若干出處「經驗」或「記憶」。從這個角度來說，陶淵明儼然製造了一套「陶淵明」論述，他以第一個讀者的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干預了個人未來的接受史。

再者，無論陶淵明是否自覺於三出四處的經驗轉換成記憶、再轉換成書寫時不可避免的美化、醜化、強化、弱化或留白，他都在宦遊主題的字裡行間，屢次複述一套宦遊記憶或退處記憶。特別微妙的是，在標示撰於宦遊途中的作品裡，陶淵明恆以退處記憶去衡量宦遊經驗；而在標示撰於歸田之後的作品裡，他又恆以宦遊記憶去衡量退處經驗。不管陶淵明實際進入的是出抑或處的身心場域，至少在創作的情境中，他都

¹¹ 葛兆光，〈背景與意義——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中一個傳統方法的反省〉，《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札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4。

會挪用另一個場域的對反視野來觀照與定義當下，並且或明或晦地透露出脫離前一場域而切換到後一場域時的焦慮、不信賴、不穩定等負面意緒。

如果陶淵明十餘年內時出時處確屬歷史事實，又合其宦遊主題中反覆召喚與造現的出處記憶以觀，則宦遊實為陶淵明下一次退隱的預備式。於此，我願意提出「前隱逸」這一新概念，以指稱陶淵明在敘述宦遊過程、同時回憶歸田之際，所呈現的某種「期待並預備再度退處」的特殊觀照視野。在這些標示撰於宦遊途中的作品裡，陶淵明所有關於「歸田」的記憶書寫，一方面不脫普遍「懷舊」的色調與語言，另一方面又被更深地賦予了「返本復初」之意：藉由複習一套甜蜜、完美而典模化的隱逸「記憶」（此中絲毫不見陶淵明歸田後的生計之難，及其亦耕夫、亦文士、亦隱者、亦家長、亦村人此諸文／質、雅／俗、群／我之角色間的可能衝突），宦遊者陶淵明暗示，他必將得以逐漸聚累徹底離棄仕宦的情緒力量和理智力量，重新恢復對隱逸生活的慣性與道德信仰。為便讀者理解何謂陶淵明宦遊主題中的「前隱逸」視野，我認為可從三要點來界定此概念：其一，陶淵明作品內自標「宦遊途中作」、亦即「尚未隱逸」或「再度隱逸之前」的「時態」；其次，其作品內表露的「終將隱逸」的「情態」；其三，其生平中「處」意始終大於「出」意，以致「三出四處而終處」的「傾向」和「週期」。下文將繼續申論。

相對於「前隱逸」，我認為還可提出另一「後仕宦」的概念，以指稱陶淵明在退處狀態中敘述歸田、並回憶宦遊時，所呈現的某種「厭倦再仕而又暗感不安」的特殊觀照視野。這批標示撰於歸田期間的宦遊主題作品，往往迴旋著如此氛圍：既慶幸遠離官場，又對辭仕不無惴惴；雖乏動力復出，但對仕宦似猶有思辨之餘地……。「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價值準繩和權威力量，仍然潛存於陶淵明歸田後憶宦的作品中；恰恰是在

「隱逸」的抉擇下，「仕宦」才充份顯現出其綿綿不絕的後座力。不過，畢竟和「前隱逸」（準備再隱）視野下的作品有所不同，我們也應明辨的重要一點，是陶淵明退處時回憶宦遊的作品，並未含有「前仕宦」（準備再仕）的積極趨向，而祇是隱晦地表現了「仕宦」意識型態延伸入歸田時期的「後仕宦」影響和反影響。為便讀者理解何謂陶淵明宦遊主題中的「後仕宦」視野，亦有三要點可資界定此概念：其一、陶淵明作品內自標的「歸田期間作」、亦即「結束上次仕宦之後」的「時態」；其二、其作品內洩露的「情態」，亦即「學優則仕」情結「後續」延伸入歸田生活，並擾動了後者的合理性；其三，「『後仕宦』的焦慮不安」不可等同於「『前仕宦』的準備再仕傾向」。下文將繼續申論。值得注意的是，在陶淵明的宦遊主題中，退處記憶的造現，遠遠較宦遊記憶的造現來得顯要。作者似乎企圖以作品為「實錄」，向讀者展示「實然」意義與「應然」意義相參的個人理型：他經常召喚某些退處記憶，他渴望由官場返居田園，渴望歸於隱逸狀態和隱逸族群，就像歸鳥（最常出現於其詩文中的意象之一）一樣，無論飛翔的距離有多邈遠，最後都會根據某種天然原始的「歸位」或「自我尋向導引」（homing）¹²本能，復還至一個自我認定的、最安全的原栖地這些退處記憶，乃是他冀以「退出」（仕途）的方式，而「進入」史不絕書的隱者譜系，成為其中一員的重要表徵。

綜言之，本文之旨，乃在有所保留地信賴陶淵明史事，如前述「三出四處」的基礎上，分析陶淵明宦遊主題中出處記憶的變造性呈現。考諸歷來的陶淵明研究，「記憶如何被書寫」顯然是陶作中尚未獲得充份釐析的問題——但如果我們繼續執持某種不辨自明的信念，以為陶作中所述的出處經驗與記憶，反映的就是「實情」，以為作者如是書寫，自然是

¹² 此詞本自動物學，但借之以況三出四處、恆求退歸田園而踵武先代隱流，且最終亦得如是的陶淵明，亦若合符節。見 Michael Allaby, *A Dictionary of Zo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3.

由於他確曾如是經驗、如是記憶；那麼，我們仍將繼續忽視陶淵明出處經驗「記憶化」，尤其是記憶「文學化」的中介過程，而恰恰是在這個過程中，原始內容經歷了重新的編易和變造，然後才形成文本。換句話說，詩文並沒有失去其反映作者的有效性，祇不過，我們應當清楚地意識到反映的真正據點何在——我們注定祇能透過陶淵明詩文中的「記憶書寫」而非「記憶」，來觸摸這位三出四處者的輪廓，同時揭示其作品詭譎多層的意義結構和修辭，調整傳統評論者對陶淵明過度正典化的認知。再者，相較於陶淵明最為後世稱頌的田園詩，後人對其宦遊詩則著墨未深，缺少精密的釐析，然而，藉由證顯詩人在此主題內潛藏的視野遞換，亦將有助於證顯宦遊詩與田園詩在理路上的鏈接和內涵上的重疊。最後，或許我們還可以嘗試探測，當諸正史名傳將陶淵明（這樣一個在一定時期內出處不定、仕固不樂，隱亦不逸的矛盾者）列為隱逸典型之際，後者細心經營的「前隱逸—後仕宦」視野遞換和出處記憶書寫，究竟遭到怎樣的看待，它究竟是一種入史的促因還是障礙？

貳、「前隱逸」視野下的宦遊： 以歸田記憶為起訖點的暫時飄泊

基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國傳統士人的宦遊體驗及其文學表達，在總體上呈現了某種模式性，王國瓔先生嘗概言：

中國知識份子，在「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下，除了極少數例外，總會經歷一段仕宦生涯，無論出任目的是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道德理想，或為生計所需，一旦步入仕途，免不了離鄉背井，經歷一些赴任、調職、出差、甚至貶謫流放之行役經驗。由於古代中國交通不便，山川阻險，風雲難測，往往行旅困難。而且幅員遼闊，路途遙遠，為了趕路，有時甚至披星戴月，翻山涉

水，辛苦不堪。再者，遠離故鄉，揮別親朋，踽踽獨行於野，難免孤單寂寞。所以結合行役經驗的宦遊詩，其基調往往是淒哀的。或訴山川阻險，或嘆羈旅久長，或感飄泊孤寂，進而引發懷鄉思歸之情，表示對宦遊生涯之厭倦。¹³

誠然，「宦遊」之「遊」，正寫真了無數士人從原鄉、從「安土重遷」、「骨肉相附」¹⁴的宗法結構和人情常態之中拔離，乃至於徙遷八方的流動景況與感受。「遊」的歷程，實為一段段身體與心理、空間與時間、經驗與記憶數者共同移動變化的歷程。而「宦遊」之「宦」，則是導致士人不得不如此流動的傳統壓力，它源自儒家學說，恆宣稱和規定：擁有知識的士人必須通過政治參與而實踐某些使命，諸如主持社會公德、維繫宗族互助紐帶、在保護大我的福祉中實現小我的存在意義等等。觀乎陶淵明一系列呈寫因「宦」而「遊」的作品，我們首先無需否認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仍隸屬於傳統宦遊行役詩的一套書寫慣例，比如重複沿用王氏指出的憂傷基調，以及「山川阻險」、「羈旅久長」、「飄泊孤寂」、「懷鄉思歸」、「厭倦宦遊」等敘述項目和邏輯進路；但另一方面，在仔細較讀下，陶淵明的宦遊詩無疑又顯出其不可歸類之處：其一、有別於先秦《詩經》、漢〈古詩十九首〉乃至建安詩中經見的「遊子」、「客子」、「征夫」範式，陶詩中的主角並未經過第三者化和無名化的轉託處理，而直採具體的第一人稱；其二、有別於魏晉宦遊行役詩每將「懷歸」的落點，設置為一般意義的「故鄉」或是象徵遁世離群的「山林」，陶詩繼李密（224-287）、張華（232-300）、夏侯湛（243-291）、左思（250-305）、潘尼（250?-311?）、張翰（256?-312?）、袁宏（328-376）、湛方生（?-?）等人在詩中零星言及

¹³ 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頁 54。

¹⁴ 「安土重遷，黎民之姓；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見漢·班固，《漢書·元帝紀》（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卷 9，頁 292。

「田園」¹⁵之後，最明確而完整地以「田園」的物境與理境取代「山林」，並因此重新限定和具體化了「故鄉」的意義範疇。換言之，陶淵明宦遊詩之新變在於，他為原本泛化於「舊土」或偏向於「山林」的「倦宦懷歸」論述程式，增添了一個「回歸田園」的新指向，而此指向又是以「群居躬耕」的生存方式和「隱逸」的精神宗旨作為前提的。

根據陶淵明「三出四處」的事實，以及他在宦遊詩中召喚退處記憶的用意，則「宦遊」始終是他「隱逸」的前奏。諸詩所述的宦遊歷程，無不籠罩於陶淵明不甘離田園、立志再退處的視野之中。出仕，宛然是以一段過去的歸田記憶為起點而暫時移動，又以下一段未來的歸田記憶為訖點。陶淵明在詩中展演的自己，總是一個既處於宦遊動態，卻又近乎靜止的身心分離者——他根生於歸田的記憶和隱逸的信念之中，不願接受移植。詩人彷彿暗示，恰恰是形體的飄泊，強化了其心志的膠固。當形體背叛了心志，心志遂亦不得不反過來超越形體，否則便是身心纏結，一併淪陷。因此，由這樣的歸田本位看來，陶淵明的宦遊詩，未嘗不是在「前隱逸」視野下寫就的「前田園詩」。

一、依準歸田記憶和意志丈量「暫」與「遠」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云：

¹⁵ 這些詩句幾乎都不屬於宦遊題材，且往往一句帶過，若非言之浮泛，用作比喻或引退套語，便是語含貶抑。如李密〈賜餞東堂詔令賦詩〉：「官無中人，不如歸田」；張華〈勵志詩〉：「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薰蕕致功，必有豐殷」、左思〈詠史詩〉：「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張翰〈贈張弋陽詩〉：「負薪弗克，耕者妨力」；袁宏〈詠史詩〉：「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79、615、733、737、920。較可注意的是夏侯湛〈春可樂〉、何劭〈贈張華詩〉、張華〈答何劭詩〉、潘尼〈答陸士衡詩〉及湛方生〈後齋詩〉、〈懷歸謠〉及〈遊園詠〉，局部細節儼若陶詩先聲。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柁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二詩撰於晉安帝隆安四年（400）。「都」即建康，「規林」為地名，據詩云「近瞻百里餘」，可知其距陶淵明故里江州潯陽柴桑不遠。又據題云「從都還」、詩云「自古嘆行役」，且陶本傳及作品中均無在京任職之記載，則陶淵明此行應是為公務赴京，事畢輒返，順道回鄉省親。歸途中舟至規林，為南風所阻，二詩正是在「得以歸，正在歸，又因客觀限制而暫不能歸」之背景下的抒感。

表面看來，一如其他宦遊詩人，陶淵明也在作品中反覆呈現「遙遠」和「暫時」的感受，但實質上則頗有不同：後者所謂的「遙遠」，有時並非指其距離任所尚有漫長的路程，「暫時」亦非指其即將抵達任所，結束一場風塵奔波，而是陶淵明依準自己歸田的意志與記憶，丈量他由於出仕而背向所居田園和耕隱理念的距離，並且聲稱這種背向祇是短暫、不得已、有悖常道的。而〈庚子〉二首，或許便是他所有宦遊作品中將「遠／近」、「久／暫」的時空感受表現得最為弔詭微妙的例子：即便是在一個離鄉極近、差堪抵家的情境下，陶淵明仍選擇了強調「遠」與「暫」的修辭方式。

「阻」是事件和詩意的重點所在。由「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等措辭，陶淵明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倒數計算抵家時間的返鄉者，回歸的路程正在越縮越短，每一寸移動都是更往故

里貼近；與此相對，和宦遊有關的時間、空間和人際關係，也持續地在身後倒退，和返鄉者的間距越拉越長，逐漸被排除在他當下的環境、人情想像和回歸情緒之外。詩人以「望」字作為另一種間接表述快樂與焦灼（相較於「一欣」和「再喜」的直接），卻更富於觸感的語言：先遣出視覺，讓它比形軀早一步到家。也因此，一旦代表故里的地標已近在視線可觸摸的範圍（「近瞻百里餘」），返鄉者舊有的身份認同感（identification）亦透過辨識本地風物（「延目識南嶺」）而益顯清晰，但形軀卻仍被懸隔在故里外圍之際，詩末的「空嘆將焉如」遂成了真正將讀者的理解推向極致，且令詩意得以無限延長的「中斷」，詩人使讀者隨同返鄉者在一陣沉默中不言而喻：被迫「戢柁守窮湖」的此地此時，就心理幻覺而言，才是離家最近也最遠、最短暫也最久長的時空距離。「歸子」本是極敏感於山川險阻、路遙日促，卻又不畏穿越這些障礙的人（「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孰料一陣與其歸心背道而馳的南風（「凱風負我心」），卻困之於近鄉的「客舟」上，使其尷尬地停頓在返鄉者／宦遊者、客子／歸子的中間狀態。「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儼然是逆風以外另一「阻」的力量象徵，藉由這片障蔽視野的物象，陶淵明再次帶出了急欲抵家者在解讀環境條件時的詭辯：予人以希望的近鄉之地，同時也可以是荒涼、危險、無盡頭、不可測的異域，它是兼具相反情態的同一塊地方，恰似正在回歸故里的主體和依然離開故里的主體並存於一人之身。

如果說〈庚子〉其一猶以「舊居」為「歸」的對象，亦猶局限於將「阻」視為客觀障礙而「怨阻」的層次；〈庚子〉其二則已明確提出以「園林」為歸趣（「園林」在此至少有三重涵義：誕生的原籍、人生肇始的端點，以及生命皈依的終點），並轉將「阻」解釋為主觀障礙，從而更深地探入「省阻」的層次。據「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

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詩人顯然已由一個「返家」途中的「他阻」事件，叩問自己何以有今日此遇，進而察及「歸田」心路中的「自阻」主因：若不「久遊」，遂無所謂「念歸」，亦無機會「淹在茲」。假如自己當初未選擇離開田園，便無需忍受今日風阻於途，乃至整個仕宦期間的身心睽違之苦。真正阻擋個人歸田的根本力量，除己之外，別無他人。值得注意的還有，不同於〈庚子〉其一，詩人在其二中表現了對異域的微妙借力：異域雖圍堵了欲突圍的人身，但人心也可以對外封閉，禁止異域的侵入，或許恰恰是在這片「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的威脅和喧囂中，心靈才借機獲得「靜念」與重憶「園林好」的片刻。詩人打造了一個恢復自我拷問能力與裁決權力的「陶淵明」（「如何」、「詎」、「復何疑」、「良可辭」、「縱心」），再次將田園記憶刮垢磨光，並把仕宦的「人間」拋入一個被懷疑乃至被否決的位置。

值此，我們發現了詩人以事件來為詩作命名的深意：一宗事件化身為啓示，從而縮寫了一種生涯的囿限與超限。從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牽念田園、瞻見田園，卻又無法還返田園的僵局，並非一場偶然的意外，它不獨發生於隆安四年不夠幸運的夏日水邊，而是依附於所有宦遊的日子。詩人設計出「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的具體時空框架，就是為了以它為墊石而超越它，盛大的「他阻—自阻—破阻」啓示，從單一「事件」的容器中不斷溢出。「庚子」一遇，被詩人轉化為有力的隱喻和觸媒，用以說釋他全部的宦遊況味，同時燃照出最美好的歸田記憶與意志。

二、樂園—圍城—樂園

沿襲〈庚子〉其二中段至末段的結構，〈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及〈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亦一致由中段開始，詠嘆對仕宦的懷疑或厭倦，再轉進末段歸田意

志的重現；〈雜詩〉其九、十、十一甚至從詩首即進入強烈的倦宦情緒。相較之下，〈辛丑〉及〈始作〉的開端，則始於回憶過往的、少時的隱處生活，從而與詩末的歸田意志形成更精密的呼應關係：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

如前所述，在陶淵明的人生中，出仕恆為上一段隱處與下一段隱處之間的斷裂；與此互為表里，陶詩亦常出現根據歸田之「未來」尤其是「過往」（或「少時」），以貶低宦遊之「現在」的評價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從主觀知覺意識去研究個體記憶的論者如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抑或是從社會框架去研究集體記憶的論者如莫里斯·哈伯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都曾指出：在人的思維和表述中，昔、今、來三者之間確實有奇特的地位落差。我們傾向於相信人生或世界的開端和來日皆優於當下，因為業已發生的和尚未發生的，都不像正在發生的事物一樣，對我們橫加種種實際的限制。從回憶的清單上，我們隨心所欲地挑選著自己希望活動於其中的任何一個時間、空間和群體關係，並以回憶為藍本去擬想未來；反之亦然，對未來的願望也影響了過去如何被回憶與定義。恰恰是在曾經和不曾生活過的世界中，我們才得以自由地生活，任意思考、慾求、行動，卻感受不到約束之強權。祇要願意，我們就能召喚、組織及改造某段記憶或幻想，且賦予它精確的形表和美好的氛圍。¹⁶這個現象，也同樣適用於解釋陶淵

¹⁶ 柏格森描述少時、未來與希望的微妙關聯：「一個不顯著的願望逐漸變為一種高度的熱情。……你的一切感覺和一切觀念都好像興奮起來，好像重新回到童年時代。……希

明詩中對「弱冠」隱處的美化、據此為基對未來隱處的美化，甚至還適用於推測：詩人對這些美化的結果很可能是真心信仰的。正由於在回憶的語言中，「歸田」是如此白璧無瑕，所以宦遊的現況才倍顯其荒謬，這反映在「如何捨此去？」「伊余何為者？」「安得久離析？」等問句上。宦遊者被拋擲出隱處生活，也無法時時刻刻滯留於隱處記憶之中。當出仕不幸地成了事實，而隱處祇能退居為記憶，詩人向讀者辯解：他仍未向現實投降，而是「一心處兩端」。他固然一度投棄了隱處而選擇另一個世界（「投策命晨裝」），但當回歸之機來臨，他同樣會以投棄的態度脫離前者（「投冠返舊墟」）。而且，他實已開始向歸田隱逸的那一端傾斜了——從「暫與園田疏」、「暫為人所羈」的詩句中，我們再次聽見陶淵明的倒數計時。

解構陶淵明在記憶書寫中所造現的隱處生涯或田園環境，可以發現若干元素是固定出現的。若比照其餘作品如〈詠貧士〉、〈讀史述九章〉、〈畫上傳贊〉等，尚可見此諸元素亦一再見用於歌詠先賢、逸民的生活。再進一步追溯，這些元素或生活故事的真正源頭，來自於先秦以降眾多經典的記載或傳聞。諸元素包括：一、琴書（經典或非經典的知識陶冶）；二、閒暇（相對於公務之勞形損神）；三、隔離（成為世俗名利的絕緣體）；

望所以是一種強烈的愉快，乃是由於這個事實：依照我們喜好而被設想的未來，同時通過許多方式呈現在我們眼前，這些方式都同樣吸引我們，都同樣有實現的可能。」見亨利·柏格森著，吳士棟譯：《時間與自由意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6-7。而莫里斯·哈布瓦赫亦有相似論點：「我們仍然擁有一種基於記憶的幻想……：今天的世界與過去的世界，特別是我們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相比，有些色彩單調，興味索然……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裡，我們佔據一個確定的位置，並服從隨之而來的約束，但相比來說，記憶給了我們一種幻覺，讓我們覺得自己正生活在不會囚禁我們的群體中間，……我們對於未來的期望，既可能更好一些，也可能更壞一些；但無論好壞，都是不確定的。過去的人們，他們的生活和行為現在都被固定在一個清楚界定的框架中，……對於他們，我們現在無所期待。」見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然譯，《論集體記憶》，頁85、88、89。

四、貧窮（如同顏回、原憲）；五、躬耕（如同長沮、桀溺）；六、個性化或本性化（「真」或「素」的強調），總基調則是自由、愉快、渾然完整。與此同時，陶淵明完全裁切了另一些詩文中對耕隱苦境的具象描寫乃至怨訴，如〈歸田園居〉其三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的「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廬。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的「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有會而作〉序的「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與子儼等疏〉的「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¹⁷，以便呈現能「隱」能「逸」的雙重境界。¹⁸有鑑於此，陶氏宦遊主題作品中的歸田「記憶」和那片恬美的田園，某部份固然取資於個人過往的親身經歷，另一部份卻是抽用經典情節、複刻傳統隱逸傳說中的生活模式。換言之，詩人糅合了個人的「自傳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和集體的「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¹⁹，而為自己和讀者築就一方紙上「樂園」，並以此牽引自身，趨向由歷代隱逸典範人物或事件所連成的隱逸譜系歸化。從「庶以善自名」來看，詩人甚至還期待讀者透過這樣的記憶書寫，而認同其「養真衡門下」的自我定位，當然，結果亦如其所願。於此，我們可看到，「回憶是否真實」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乃取決於「它們能否在一個公共溝

¹⁷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霽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2，頁85、108；卷3，頁206、306；卷7，頁529-530。

¹⁸ 據許尤娜對魏晉「隱逸」思想的研究，「隱逸」之「逸」除指「奔逃」的動作、「亡失不見」的狀態之外，還描述「暇逸安樂」的心境。真正的「隱逸」不僅「逃藏不仕」，更重要的是能「因藏匿而得一種暇逸安樂」。見許尤娜，《魏晉隱逸思想及其美學涵義》（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頁13-14。

¹⁹ 據哈布瓦赫及其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學說，一人心智中可並存兩種記憶，即「自傳記憶」及「歷史記憶」。前者是個人對生命中親歷的種種事件的記憶；後者則藉由文字、圖象、物質、節日、儀式等各類媒介，而被保存與傳承。見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然譯，《論集體記憶》。

通的場合被人敘述和被人接受」²⁰，取決於回憶表述者是否選對了一套符合集體慣例與需求（如崇尚「隱逸」的文化價值）的語言策略。

相對於樂園化的田園記憶，陶淵明再現的仕宦場域，則彷彿「圍城」，對他構成禁錮與奴役；而「圍城」感的營造，則有賴於詩人頻密套用了傳統宦遊詩的一系列關鍵字，如「羈」、「拘」、「縶」、「制」、「淹」、「隔」、「驅」、「役」等。撰於鎮軍參軍時的〈雜詩〉其九可為典型：「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飡。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詩人表示他懷矛盾以遠宦，卻又因路途遼遠而不便在短時間內往返於任所和鄉梓之間，或許連音書傳遞亦有困難，故宦遊中的創作遂成其唯一寄托。不過，如此具體的告白，同時也是個象徵：所有自由和回歸原點的可能性都消失了，宦遊者被封閉在仕宦的無形圍城裡，和家人、田園以及從前的「自我」隔絕；甚至書寫最終也將異化為這座圍城的其中一塊磚石，詩人的心跡徒然在作品中重疊、反彈，詩作為無解的回音壁，最後也孤立了詩人。

綜言之，陶淵明宦遊詩中「出樂園—入圍城—返樂園」的進路，呼應於他在現實中處而復出，終而永歸田里的形態。而他對於樂園式田園的記憶造現，顯然是為了填充每次因宦遊而出現的田居經驗空白，這正是記憶書寫的兩大特徵：「當前指揮著過去」，記憶可以根據現實需求而進行重構，「祇有規定用來讓當前變得明亮或晦暗的那一部份過去，才影響到當前」²¹；其次，當主體被隔離於其欲附屬的族群（如隱逸譜系或農村）之外，或是其欲延續的經驗（如歸田）被打斷、與此經驗相關的記

²⁰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回憶有多真實？〉，收入哈拉爾德·威爾策編，季斌等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頁 68。

²¹ 伊塔洛·斯韋沃（Italo Svevo）語，見引於阿萊達·阿斯曼，〈回憶有多真實？〉，收入哈拉爾德·威爾策編，季斌等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頁 62。

憶亦可能淡褪之際，記憶的不斷複寫將有助於週期性和選擇性地強化記憶，代替實際缺席的經驗而成爲生活中的「虛擬經驗」，並架接主體和族群之間的紐帶，維繫彼此間的凝聚力與認同感。²²我們可以說，借由宦遊詩的記憶書寫，陶淵明「通過把自己的現在與自己建構的過去對置起來，而意識到了自身。」²³

三、異鄉風物：冗誤的他者或當歸的證據

一旦進入人的視野，山水風物便不再是單純獨立的客體，而是被人文化爲主體的一部份。宦遊途中的山水風物宛如一面面透明的稜鏡，在吸收了宦遊者的觀照與詮釋之後，又折射出其人如何觀照、詮釋宦遊時空下的自身。

宦遊的陶淵明對眼前流動的異鄉景色，有兩種書寫的角度：以之爲冗誤的他者，或當歸的證據。前者以〈始作〉爲代表。詩人強調自己當下最鮮明的知覺，便是對異鄉的厭斥以及個人的錯置，他「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缺乏一個旅人初到陌生環境時的好奇和興奮，於是不斷收攝眼底的外部世界，又不斷被他從內在視域中抹除。陶淵明更側重於把自己標記成暫時離開「山澤居」的「定居者」，而非有機會遊觀各處「山澤」的「移動者」。就某種「淳正」的人生而言，異鄉風物和仕宦身份一樣，都是橫生枝節，多餘而舛誤。確實，在陶淵明的宦遊詩裡，除了〈辛丑〉「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一段，我們幾乎不見像潘岳（247-300）〈河陽縣作〉、〈在懷縣作〉、陸機（261-303）〈赴洛道中作〉、顏延之〈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謝靈運

²² 王明珂，〈記憶、歷史與族群本質〉，《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出版社，2005年），頁41-60。

²³ 劉易斯·科瑟（Lewis Coser），〈導言〉，收入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43。

(385-433)〈過始寧墅〉、〈初去郡〉、鮑照(414-466)〈還都道中作〉、謝朓(464-499)〈休休重還道中〉、江淹(444-505)〈望荆山〉、沈約(441-513)〈早發定山〉等作一樣充滿諦察興趣且詳緻的景物描寫，儘管後者亦無不聲稱自己倦宦懷歸。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兩重「鏡像」(mirror image)，或謂自我的「他者化」(otherize)²⁴：作為一個創作主體，陶淵明把作為宦遊經驗主體的自己當成一個書寫對象而他者化，這並不難理解；更微妙的是，詩中的主體(主角)，也同樣把自己他者化了。詩中的宦遊者不肯適應宦遊，自外於陌生物境，也自外於宦遊中的自己，從而異化為自己的旁觀者和悲憫者，使個人成了宦遊途中真正的他鄉物色：在「眇眇孤舟逝」的畫面中，宦遊者是他想像中某幅「江天一人」的孤絕風景。(藏在這落單形象之下的，則是「緜緜歸思紆」的懼退。「眇眇」與「緜緜」、「逝」與「紆」扭結為一股張力，舟行的航線往前延伸的同時，歸田的思路也往反方向延伸。)而這雙重的鏡像或他者化的作用，乃在於「為了完成自我，必須創造一個他者」²⁵，在於樹立、對比和完善化另一套可能「更好的」價值體系。

至於第二種書寫角度，主要是將異地風物納入懷舊傷逝的視野，從而成為當歸的證據。如〈乙巳〉及〈雜詩〉其十一：

²⁴ 巴赫丁(M.M. Bakhtin)曾以鏡為喻，說明鏡中映像是自我客體化的結果，自我以此而轉成他者，「我們在鏡前體驗的是某個不確定的可能的他者，藉助這個他者，我們試圖尋求自身的價值立場，並從他者身上激活自己而形成自己。」同理，作者創造的人物，既是自己也是他者，是創作主體的「鏡像」。見 M.M. Bakhtin, "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tic Activity," in *Art and Answerability: Early Philosophical Essays*, ed. Michael Lovich Holquist and Vadim Liapunov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18, 32-35, 引自王瓊玲：〈導論：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11。

²⁵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13。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颿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乙巳〉）

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涉暑經秋霜。（〈雜詩〉其十一）

「斯境」是否確然「事事悉如昔」，已無須考實，因為在中國古典文學的書寫範式中，「物是」的強調，往往是為了反襯「人非」，而「物是人非」又可進一步指涉「昨是今非」。一處「斯境」，是從「昔」的整體中剝落的「斷片」（fragment）之一，向讀者傳遞著未仕時期的境況、氣氛、情緒（如「微雨洗高林，清颿矯雲翮」的愉悅，如「義風都未隔」的生機勃勃），誠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釋，斷片的「意義、魅力和價值都不包含在它自身之中」，「它超越於詩的時間性之外，向我們指出了圍繞著它的生活世界以及在它之中的內在的感情世界」²⁶。重臨的「斯境」及油然興發的回憶，捲帶來全盤美好（美化）的過去，並分裂了宦遊者與官場的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宦遊者從斷片中發掘出一部亦復得亦失落的歸田歷史。至若〈雜詩〉其十一，實際上我們亦不必判分這些慣見於中國詩文中的燕迴雁歸、清池離鷗、時季遷變等等，究竟是陶淵明宦遊時目睹的物象，抑或是詩人選用的意象。需要注意的祇是，在這類書寫程式中，時間感知的「節變」帶動了空間感知的「物化」，「空間往往沒入時間之中，可以直接表徵時間刻度，於是時間上的『懷往』，也就容易假托空間上的『懷歸』來加以表現」，「『逆時之想』顯然才是『望

²⁶ 宇文所安視「斷片形態」為中國文學的藝術特徵之一：「斷片最有效的特性之一是它的價值集聚性，因為斷片所涉及的東西超出它自身之外」，「它起了『方向指標』的作用，起了把我們引向失去的東西所造成的空間的那種引路人的作用」，「我們看到的祇是一則表面的斷片，而這則斷片卻足以使我們朝整體延續下去。」見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斷片〉，《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頁94、105、108、109。

歸之思』最潛藏的意識，而『時不可逆』也正是自欺自慰的『遠望當歸』最無以解脫的悲情困境」²⁷，於是，我們或許可由此窺知詩人的用意：他以此諸物象／意象作為理據（像這些時物一樣循環），不單是召喚自己回歸田園，也前往未來——回歸到一個仿照著實不可逆的過去而全新打造的「過去」。

總之，對於既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又拒絕與新環境合一的陶淵明而言，他在呈寫異鄉風物時，採用了同時參照「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實況」的「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一種觀念或經驗總是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驗」，他呈寫的態度是「不樂」的，或嚴格地說，是「以不樂為樂」——這種態度是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對流亡知識份子的概括，但亦未嘗不適用於宦遊者，「(以不樂為樂)不但成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為一種新的，也許是暫時的安身立命方式。」²⁸

參、「後仕宦」視野下的歸田： 宦遊記憶對隱逸本位的慢性擾蝕

一、掩埋於〈飲酒〉自序中的解詩入徑：遮蔽構成顯示

據〈飲酒二十首〉自序：

余閒居寡歡，兼秋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焉。²⁹

²⁷ 鄭毓瑜，〈推移中的瞬間——六朝士人於「歎逝」、「思舊」中的「現在」體驗〉，《六朝情境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頁72、74。

²⁸ 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97、87、91。

²⁹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3，頁235。

以及其十九「終死歸田里，亭亭復一紀」，則〈飲酒〉諸詩應作於陶淵明辭彭澤令至少十二年後的某秋。歷代以來，選家或詩評家幾乎一致公認〈飲酒二十首〉章句謹嚴、寄託紆深；至於諸家說法之異，除了對諸詩具體影射的是何時事，各有不同比附外，另一主要的分歧點則在於「飲酒」及「醉」對陶淵明而言，究竟是確有其事、作者好以杯物遺世忘憂³⁰，抑或是某種「體道」境界的喻辭³¹，又或祇是作者借之以發抒百感時的託辭？這項爭議反映到〈飲酒二十首·自序〉上，便是未必人人皆信陶淵明撰詩之際，真如其序中自謂的昏懵而無意為詩。信者固恆信陶雖不措心於工拙，但一出語便自然超詣，大巧若拙³²；但疑者卻認為，詩人非但意識清醒，甚至還可以說是落筆審慎的。姑舉其隅，如蕭統即云：「有疑

³⁰ 如元·劉履：「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故每每得酒，飲必盡醉」，劉履《文選詩補注》（上海：掃葉山房，1921年），卷5，頁8；清·蔣薰：「飲雖不豪，能於寂寞中有此閒適，真是韻事」，蔣薰《陶淵明詩集》，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3，頁156；邱嘉穗：「公抱道統絕續之憂，而終以酒自解如此」，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卷3，頁199。

³¹ 如明·黃文煥：「索解大悟之後，乃可以飲酒，說出酒人大來歷。胸中有疑，酒不許下咽矣」，黃文煥《陶詩析義》，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卷3，頁159；清·溫汝能：「淵明忘我更勝於〈齊物〉，其殆酒中之聖者歟」，溫汝能《陶詩彙評》（上海：掃葉山房，1928年），卷3，頁15；張潮等：「少年好經，晚年嗜酒，自有趣味，若今人一味嗜酒，自以為達，非也」，張潮、卓爾堪、張師孔同閱《曹陶謝三家詩陶集》，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卷3，頁189。

³² 如宋·葛立方：「蓋摘章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睹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謝康樂、庾義城）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葛立方《韻語陽秋》，見《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卷3，頁2；晁補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晁補之《雞肋集》卷33，見影印本《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第1123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清·沈德潛：「胸有元氣，自然流出，稍著痕跡便失之。」沈德潛，《古詩源》（光緒十七年思賢書局重刊本），卷9，頁4。

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³³，葉夢得（1077-1148）亦嘗云「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³⁴，鍾惺（1574-1625）云：「〈飲酒〉詩如此寄託，如此含吐，酒豈易飲？飲酒豈易作詩？」³⁵陶必銓（1755-1805）云：「此二十首，當是晉宋易代之際，借飲酒以寓言。」³⁶這意味著，陶淵明僅是虛傍「飲酒」及「醉」之名目，以掩飾其一吐胸中塊壘。

不可否認，這樣的修飾／修辭行為自與避免在亂世間構筆言禍有關，但更令人深感興味的恐怕是，我們發現自己難以確切地捕捉陶淵明經此塑就的個人形象，「陶淵明」變幻無方，他究竟是某個因貪杯而暫時褪除理智，故世人應笑納其言行謬誤的醉者（「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其二十³⁷）？某個附從六朝飲酒之時風，因以點染生活品味的文士？某個藉酒以解放身體和人生的種種界限，恢復心靈之自由自然，並享受抒寫快感的創作主體³⁸？還是更根本的——「陶淵明」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單純者」，也是一個（充份自覺的）「不自覺者」？詩人

³³ 《梁昭明太子文集》卷4，見《四部備要·集部》（上海：中華書局，1949年），卷10，頁5。

³⁴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百部叢書集成》，卷下，頁6。

³⁵ 明·鍾惺，《古詩歸》（明萬曆丁巳年刊本），卷9，頁16。

³⁶ 清·陶必銓，《蕙江詩話》，見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原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卷3，頁21。

³⁷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3，頁282。

³⁸ 不少今代論者皆在前提上視陶淵明詩文中的「飲酒」為其實際好尚，再由此出發，論析陶淵明將酒這種精神刺激物質援借為解放生命的媒介，故能從本易偏向於生理慾求的服飲行為中，轉出某些特殊的心靈經驗或生命境界，從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存在的限制。見顏崑陽，〈從「飲酒」論陶淵明的生命境界〉，《六朝文學觀念叢論》（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頁286-321，或蔡瑜，〈從飲酒到自然——以陶詩為核心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期22（2005年6月），頁223-268。此固為一說，但本文則試圖由語言策略的、修辭的角度論陶之「飲酒」。

企圖以家常但詳細的口吻，將隱形的廣大讀者帶回他撰寫〈飲酒〉組詩期間的「原始」場景：在漫長無趣的秋夜中，每首詩都宛如一場自娛娛人的偶然小事故，無一句不出於酩酊、興之所至。這些情狀都構成了「證據」，可資證明其創作活動是非計劃性的、自然而然的。如宇文所安洞察的，對陶淵明而言，自序是必要的，因為他似乎力求「向我們擔保，這些詩作的公開流通（以及詩人可能的得名），並非其本意。」然而，恰恰是由於這些「過度的自覺意識，為一己行為和價值觀所作的辯解，以及奮力想超脫內在衝突而返樸歸真的嘗試」，反而曝顯了陶淵明並不是一個其所聲稱的天真而直率的詩人。宇文所安亦再三強調：「陶淵明的詩充滿了矛盾，這些矛盾來自於一個複雜且自覺的人渴望變得不複雜且不自覺」，陶淵明真正「吸引我們的或許是他對單純的複雜渴望而非單純本身。」³⁹有鑑於此，〈飲酒〉自序雖未滿百字，卻幾乎由似是而非的話語串聯而成：「無夕不飲」、「忽焉復醉」、「辭無詮次」——清明有序的構詩能力；「以為歡笑」的撰寫目的——「閒居寡歡」的底色，以及有意累存詩作而致「紙墨遂多」；「數句」塗鴉——在手抄本的年代，「聊命故人書之」的傳寫傳閱價值。⁴⁰如果我們反轉這些「正言」，自序向我們顯現的，便是一套長久以來被「飲酒」所掩埋的解讀〈飲酒〉詩的策略：字面推翻字面。詩句的功能，在於以遮蔽構成顯示。表象的世界祇是為了維護底層另一個世界的存在而創造的。我們最後應當讀到的，可能延伸——

³⁹ Stephen Owen, "The Self's Perfect Mirror: Poetry as Autobiography," in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ed. Shuen-fu Lin and Stephen Owen, 81,77,83.

⁴⁰ 從手抄本文化研究的角度，田曉菲亦有力地論證了〈飲酒二十首〉自序之似是而非：「在手抄本時代，文本的保存完全建立在抄寫的基礎上，因此，抄寫的意義，實在遠遠超出了『以為歡笑』的範圍：文本祇有被人抄寫才能流傳，流傳越廣泛，得以存留到後世的機會就越大。」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0。

卻也可能搖撼、否定我們最初讀到的。讀陶淵明憶述出仕辭官、總結今昔的〈飲酒〉其十與其十九，亦當作如是觀。

二、從回想「宦遊」的痛覺到「必須回想宦遊」的第二重痛覺

〈飲酒〉其十及十九云：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儘管距離最後一次出仕已逾一紀，但「遙遠」與「險阻」，仍然是陶淵明言及「宦遊」時的兩大特徵，它們在詩中被表現為強度記憶，並未隨著歷次宦遊從經驗轉入書寫而消失。為了舉出宦遊履歷中遙遠和險阻的範例，陶淵明重提了「直至東海隅」，亦即離鄉最遠⁴¹、可能也是最令他不適的鎮軍參軍任上的代表性片段。關於當年出仕、辭官的原因和態度，陶淵明呈現的記憶似乎也是相當明確的：出仕，乃迫於長期饑乏；至於辭官，他在〈飲酒〉其十中解釋，人們竭盡全力營役，究其終極目的，也不過是為求維生之一飽；但既然「飽」的基準輕易可及，則如此簡單的問題，實無必要通過複雜的方式（如忍受仕宦）來解決，執此則恐非明智之計。〈飲酒〉其十九中，陶淵明透露了更詳盡的細節，即仕宦非但

⁴¹ 齊益壽曾據〈雜詩〉其九及十的「掩淚汎東逝」和「軒裳逝東裳」，並考當時的鎮軍將軍劉裕治所京口遠在建康東北方的海隅之地，而繫此二詩於陶淵明任鎮軍參軍時。見齊益壽，〈陶淵明的宦遊詩〉，頁 210。今〈飲酒〉其十的「直至東海隅」句近〈雜詩〉，故亦可能指涉鎮軍參軍任上事。

未解決最低限度的溫飽需求，甚至還進一步威脅他想恪守的耿介人格，於是他決定永歸田里，終身不仕。

然而，我們有理由懷疑這番記憶的陳述是否過於簡潔，而且是否足夠理直氣壯——應當注意，「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和「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之間潛藏著張力，它撕開了表面上平滑無隙的辭仕辯解，而向我們微微敞開一個切入「別解」的缺口。陶淵明暗示，當十二年緩慢而遙遠地流逝之後，他卻仍佇足於決定辭仕與否的分岔路，於此，他援用了《淮南子·說林訓》的「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⁴²，一個關於猶豫、停頓、矛盾和無解，且為喪亂中的六朝詩人所頻引的憂傷典故。人一生無法兩次涉入相同的一條河。生命祇能是張草圖，經驗將永遠留下印跡，不可拭除，重行改畫，一如時間之不可倒流；後起的經驗將繼續錯織覆蓋於先前既存的經驗之上，一如當下的時間接續過去的時間而流向未來。故從終極角度而言，任何選擇都是無比艱難的，因為決定後縱使反悔，人亦無法回到決定前的本然狀態。但陶淵明卻告知我們，他穿越了詩的超時空管道，重返並定格於選擇出處的一刻，此遂擾亂了我們根據他前述的記憶和辯解所得出的判斷：讀者本已相信「終死歸田里」是陶淵明早前作下的決定，這個決定行為本身，已成為歷史事件；可他卻婉藏地表示，辭仕仍是一項在心理上被持續思辨、權衡利害的議題，其實他不肯定何所當止。對應於這種出處心態上的遊移不定，陶淵明的「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一句，遂顯出了奇特的進行式性質：句表似乎僅僅指涉「回憶中的、過往的某個當前時刻」，細讀之下，又同時含有指涉著「撰寫時的當前」的句感。過往的恐非之慮與息駕之歸，不僅一直蔓衍到撰寫時

⁴² 漢·劉安著，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17，頁583。

的當前，甚至直到這個當前也未停止，隱約還要伸入未來的邊界。在這個句子中，過往、當前和未來的限定性是模糊的，三段時間互相交疊滲透。實際上，我們難以辨分陶淵明寫下「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時，究竟是專指三段時間內的某一個當前，還是遍指三段時間內的每一個當前。

對一個早已決定歸田，並且久已落實此歸田決定的人而言，在不祇一首詩中重複回憶當年宦遊的陰暗經驗和歸田的光輝理由，其動機可能不止於閒居時演義個人掌故的無聊，亦或意在重新溫習一遍由推導到決定的歷史經驗，以鞏固動搖了的歸田意志。再者，這段「歷史經驗」顯然已經過了某些篩選、剪裁和變造，從而突顯了仕宦的有弊無利（值得放棄），以及棄官者的明決果斷（能夠放棄）。詩人祇述及初仕江州祭酒（「是時向立年」）和終辭彭澤令（「終死歸田里」）首尾兩段，中間以「遂」跳接，切除了桓玄幕僚、鎮軍參軍和建威參軍三仕，這便導致了仕宦經歷再現時的簡化、留白，以及歸田意志再現時的強化、純化，彷彿他旋出旋處，迷而即悟，毫無猶豫和反覆的片刻。至於重提宦遊的遙遠和險阻時，陶淵明亦未嘗不是在記憶和想像之中，觸摸他忍受遙遠和險阻所能到達的極限，從而弔詭地再次感染他對遙遠和險阻的痛覺，召喚「在昔曾遠遊」而深受此痛覺折磨的另一個自己，以與當下已疏遠仕宦之苦（而身陷於躬耕之苦）的自己進行合體。此誠如柏格森指出的記憶與知覺的交織代換，「越是努力地回憶過去的一種痛苦，在現實中就越是接近那種感受」，「雖然劇烈痛苦減輕了，但對它的記憶反而會是劇烈的痛苦。」⁴³此外，詩人談論饑餓時的措辭也頗值咀嚼，由「似為饑所驅」之「似」來看，他在回憶出仕動因時，隱含了難以啓齒的羞澀，因為心從形役的最大驅動力，原是如此動物性十足的求存本能。因此，詩人談論

⁴³ 亨利·柏格森著，肖聿譯，《材料與記憶》，頁 119-120。

饑餓感，亦即召喚羞恥感。他並非透過回憶饑餓所帶來的生存恐慌，以合理化饑餓所迫下的出仕抉擇；相反地，他是在回憶饑餓被填補之後的道德恐慌，藉此表示不容許自己因屈服於饑餓而再度出仕。如果說中國傳統士人其中一種「獲取自由的方向是退卻」⁴⁴，那麼陶淵明的詩無疑為「如何退」的雙重性提供了說明：既是從社會的束縛中退卻，也是從自身肉體的慾望中退卻。

綜察之下，〈飲酒〉其十及十九實際上密佈著各種各樣通過記憶而造現的痛覺：饑餓的生理痛覺、為饑從仕的道德痛覺、跋涉遠宦的懷鄉痛覺、辭仕歸田的反主流痛覺。第一種痛覺橫亙於陶淵明出處生涯，未嘗稍解，第二、三種痛覺與宦遊記憶纏結，第四種痛覺則附隨於退處經驗。陶淵明似擬藉由放大式地回憶／想像棄官時的無痛和宦遊時的苦痛，以調停歸田十餘年後猶存的「一心處兩端」僵局。他在回憶中虛擬地重歷宦遊的痛覺，是為了提醒自己不應再仕（不應再實際地經驗上述痛覺）——然而，我們不免有疑，當「回憶仕宦之痛覺」被視為某種「遺忘仕宦之必要」的工具，當陶淵明無法不帶有強迫性地、屢次自覺地去召喚那可能已逐漸淡褪的反感時，這難道不是在回想「宦遊的痛苦」之外，又構成了「不得不回想宦遊」的第二重痛苦嗎？陶淵明仍然深受「學優則仕」的意識型態所鉗制，祇不過是從「仕宦」時的不自由，邁入「後仕宦」狀態更深層、更隱形的不自由。即使「宦遊」已轉化為變形的記憶，但它同樣能和宦遊者歸田後的不安化合在一起，甚至比它作為經驗時具有更頑韌的擾蝕力，持續動搖著陶淵明的隱逸本位。

⁴⁴ 張法，〈荒誕與自由：中西文化自由極境的審美凝結〉，《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臺北：淑馨出版社，1998年），頁164。

肆、未然的記憶：
〈歸去來兮辭並序〉中
「前隱逸」和「後仕宦」視野的並存與調停

一、序文：作為正文重要的局部結構

陶淵明所有攸關宦遊的作品中，尤以撰於乙巳歲（405）十一月任彭澤令兩月餘後「自免去職」、得以歸而未歸之際的〈歸去來兮辭並序〉，在出處記憶的造現上最為詭譎複雜。

誠然，有鑑於陶淵明過往每因「耕植不足以自給」之家計，反覆處而復出的歷史，我們實難以斷言其辭彭澤令時，內心究竟有多大自信能保證個人未來絕不再仕；但在最低程度上可釐定者，乃陶淵明至少在〈歸去來兮辭〉，特別是辭前自序中，作出了對過往的總結，以及預先否決復出可能性的聲明。這樣的姿態，一方面反映在若干近乎斬截的字句和語氣上，如「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另一方面亦反映在自序總結往事的雙重性上——表面雖以僅僅回顧一任彭澤令的出、辭原因，宣稱了斷這段經歷；實則同樣的原因，亦可挪用於解釋其歷次出處，並切割仕宦與整個未來的關係。一段序文，實即一部陶淵明的仕隱小史，濃縮了他對一生出處的自傳性記憶與說解。

綜觀之下，陶淵明在序中憶述出處原因時，自我反覆拉鋸自我的理路躍然紙上，如「余家貧……故便求之」，釋明任彭澤令的經濟需求前提；繼云「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深愧平生之志」，駁反前意，省及此位不值久留；又繼云「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再次延宕去職期限；末云：「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終於顛覆前意。正因整部自序不斷穿織欲出或欲處的不同焦慮，不斷調換「前隱逸—後仕宦」的

不同視野，故導致這所有的壓力感層遞、累積到最後，使序尾的「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和「乙巳歲十一月」顯得不僅是對單一任期結束時的清算盤點，而更像是把「乙巳辭令」當成具有界限意義的歷史事件，據此重新斷代個人的生命。從這個起訖點開始，作為宦遊者與作為歸田者的陶淵明正式一分為二，可以在他私人心靈史的標準下各劃入不同的編年紀月，也可以和公共道德的標準達致另一種磨合——宦途中的「不器」者雖無希望進入「有為」之士的譜系，卻有可能因其「無跡（績）」而成為史書〈隱逸傳〉中述贊的一個名字。

和〈飲酒〉自序一樣，在此序中作者亦試圖將詮釋權操諸己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規範讀者理解「陶淵明」的方向。從這角度嚴格說來，〈歸去來兮辭〉的「序文」並不懸隔於「作品」之外，亦不「隸屬」於「正文」，因為它本身就是「正文」重要的局部結構之一，它存在於「作品」中而使之完整。關於這一點，尚有若干特定跡象可資論證：首先，若按袁行霈校本，正文凡 340 字，序文凡 198 字，篇幅已逾正文之半，陶淵明拉近正文與序文間的字數比例，多少意味著他提高了序文的重要性，以均衡二者間的意義比例。再者，序文的重要性又體現於它和正文緊密合作，而反襯出兩個「陶淵明」，正文需要序文的內容去共同構成前後發展的起伏節奏，以及今昔對照的強烈效果，否則便無以完整地呈演陶淵明離鄉為宦，終又由出入處的變化感，尤其是箇中的宣誓意味。在此可引川合康三（Kawai Kozo）的說法作為補充，其指出序文和正文不僅在空間移動的方向上是相反的（序文寫由鄉里到彭澤縣，正文則寫由彭澤縣到鄉里），且「在兩者的空間移動中可看出曲折與直行的對比。在『序』離開鄉里往彭澤縣的旅程極富曲折性」；而伴隨著空間移動的對比，亦描現出陶淵明形象的對比，「在『序』中之所以描繪出那樣懦弱的自我，其實是在講述在到達生存之道的漫長摸索。藉著在『序』裡描寫各種嘗試

的自己而導出找到本來自我的『辭』。」⁴⁵可附帶一提的是，也正因序文中的陶氏形象是如此迫於生計而狼狽出任、在仕隱問題上又每顯心念浮動，處志不堅，儼然干擾了正文中另一個純粹而無雜質的「隱逸者」之成立，故沈約《宋書·隱逸傳》和蕭統⁴⁶《文選》皆未錄序而但收其辭，可見修史者或編集者乃至歷代的無數讀者，都「更關注陶潛作為隱士的『公眾』形象（與〈隱逸傳〉中其他人物一致），而不是陶潛作為詩人的『私人』的一面。」⁴⁷經常兩難於出處的傳統中國士人太需要言行始終一致，內心從無波瀾的隱逸正典了，於是，他們選擇了一個「無序」的解釋框架，重新裁切、塑造、定位「陶淵明」及傳播其作品，原〈歸去來兮辭並序〉的矛盾複雜遂變得「有序」了。

接著，在轉進〈歸去來兮辭〉的討論之前，我們應意識到，作者明確地公告了他撰寫〈歸去來兮辭〉的具體時空：將歸，而未歸。陶淵明正處於非出非處的間歇。這意味著，〈辭〉中所述一切歸田場景及心境，無不出諸作者的想像。

二、正文：以已然時態說未然情境

陶淵明於序末表示退處之願成真，「因事順心」，形同預告了正文的〈歸去來兮辭〉將切換入另一種迥異於序文的單純、歡愉和暢快；然而，

⁴⁵ 川合康三（Kawai Kozo）著，林欣慧譯，〈從空間移動視點探討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並序〉要旨〉，收入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頁13。

⁴⁶ 蕭統無疑崇拜乃至美化了陶淵明「隱逸」的一面，他所以在《文選》之外又為後者專編《陶淵明集》，主要仍是著眼於道德教化的價值，他對陶氏作品「超拔」的形容很大程度是附庸於陶氏人品的「超拔」之上，觀其序可知：「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技；跌蕩昭章，獨起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此亦有助於風教爾。」《梁昭明太子文集》，卷4，見《四部備要·集部》，卷10，頁5。

⁴⁷ 孫康宜，〈揭開陶潛的面具——經典化與讀者反應〉，《文學的聲音》（臺北：三民書局，2001年），頁148。

一旦我們從這樣迷人中的氛圍稍稍醒覺，察見它原來背靠著一個想像的支架，則正文的修辭技術遂頓成〈歸去來兮辭〉中極耐人尋味的問題。

在結構上，〈歸去來兮辭〉漸次鋪展開一連串時空移動的過程：歸田的路程（「舟搖搖以輕揚……恨晨光之熹微」）、到家的一刻（「乃瞻衡宇……審容膝之易安」）、開始家居生涯（「園日涉以成趣……樂琴書以消憂」）、開始農事（「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間有山水遊憩活動（「或命巾車……臨清流而賦詩」）。同時，也穿插了陶淵明預想中在歸田後因斬絕宦途而興起的不安和自我說服。我們很難不眩惑於這番想像的不似想像、未來式的不似未來式——從人與物的動作、關係配置、聲色膚觸等感官感受，到更精微的心理感受，所有的細節都被描述得如此詳緻、緊密連貫、現場感十足——彷彿這一切事件正在發生，又彷彿它們不過剛於上一秒鐘化爲猶新的記憶；陶淵明像是幸運地掌握了某種奇技，他的記憶能如此完好地封凍當下一系列身心感驗，而他的書寫又能原樣載錄這些記憶，過去式遂永遠可以被轉譯爲現在式。確實，陶淵明極成功地將讀者導入了對作者「當前知覺」的誤信，使其粘滯於時態上詭異的「綿延」（duration）⁴⁸，而每每遺忘了〈歸去來兮辭〉本祇是以陶淵明過往歷次田居經驗的若干記憶抽樣作爲材料，再經其「主觀預擬」和「樂觀想望」的美化程序，從而編織成的一幅「自我預約未來生命的藍圖」⁴⁹。陶淵明選擇性地汲取了歸田的記憶而進行同題想像，同時也就

⁴⁸ 「綿延」是柏格森論記憶表述時深具啓發性的重要概念：「我說到自己的當前知覺時的當前，則必定要佔據一段段綿延。……我稱爲『我的當前』的一隻腳踏在我的過去，另一隻腳踏在我的未來。首先，說它在我的過去，是因為『我正在說到的那一刻已經遠離了我』；其次，說它在我的未來，是因為這個瞬間正在迫近未來。……被我稱作『我的當前』的這種精神狀態，必定既是對剛剛逝去的過去的知覺，又是對即將到來的未來的確定。」亨利·柏格森著，肖聿譯，《材料與記憶》，頁121。

⁴⁹ 許東海，〈歸返、夢幻、焦慮：從陶、柳辭賦論歸田書寫的文類流變及其創作意蘊〉，《漢學研究》卷22期1（2004年6月），頁65-66。

憑借想像而再度活化（包括變化）了過去的部分事物和自我，將之移置到現前。在這過程中，又有著正在回憶和想像的「我」（the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self），以及被回憶和想像所帶出的「我」（the remembered and imagined self）的區別。一般上，讀者如果不是迷醉於〈歸去來兮辭〉的現行時態，而未注意到上述二者的差異，便是陷入其中之一較為「真實」而另一者祇是「影像」的思辨。但實際上，陶淵明乃是由這兩種「我」所綜合建構出的同一者（identity），且作品之所以值得深嚼，離不開兩種「我」的交互作用，它們具有同等的價值。⁵⁰

陶淵明不僅虛構了歸田時的表面場景，他同樣也根據昔日退處時的經驗，從而預見了歸田後「後仕宦」心理的猶豫焦灼，並進一步虛構此猶豫焦灼之被調停。一切疑慮在這個虛構世界中都能夠被順利地開釋，他自問自答，「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甚至以問解問，「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所有和歸田有關的事件及其影響全都尚未發生，卻無一不在〈歸來兮去辭〉中被預設為已然發生，而且已然解決。〈歸去來兮辭〉將陶淵明「未然」的歸田夢幻和歸田憂患，全部套入一個「已然」的世界，「前隱逸」的期待—不必期待和「後仕宦」的不安—不必不安，同時被摺疊而並存在一起。在此，想像不但可以活化過去的記憶，也是通往未來的預期。陶淵明如此事先採樣未來的自己，考量正反面情況，想像願望的滿足，恐怕是由於惟有通過種種對未來的擬想，人方得以在一堆可能性中「選定其中一個而成為現實」，「傾向做出一個能把我們帶往那個樣子的決定」，任何理性決定，實皆不能離乎一個看似不理性的摹思預估的先沿階段⁵¹，因此，歸田想像和歸田決定之間實攸關甚切。

⁵⁰ 羅伯·索科羅斯基（Robert Sokolowski）著，李維倫譯，〈知覺、記憶與想像〉，《現象學十四講》（臺北：心靈工坊，2004年），頁109~110。

⁵¹ 羅伯·索科羅斯基著，李維倫譯，〈知覺、記憶與想像〉，《現象學十四講》，頁114-115。

陶淵明的歸田想像吸附、拼接了許多特定記憶的斷片，如同破鏡重圓，反射出「事實」的光澤；至於曾經令他愁苦佛鬱、出處不定的另一大片事實和記憶，則被摒除在〈歸去來兮辭〉之外，至少是被圈限在〈辭〉前序文當中。〈歸去來兮辭〉正文，是一個既向記錄昨日仕宦的序文世界借力發展，又欲與之劃清疆界以獨立的明日隱逸世界，是從不夠愉悅不夠單純的個人歷史中重新生長出的另一段夢幻故事，有田有園，有鄰有家，傍水依山，自給自足，卻不必再具體地應付與解釋出仕的需求。在正文中，「前隱逸」的預約以「隱逸」的既定結果出現，而「後仕宦」的心結亦在此虛擬的世界中被調停。現實中的陶淵明將要歸返的是一個基本生活問題繼續存在的普通農村，但撰寫〈歸去來兮辭〉的陶淵明，祇讓我們看到，他歸返於去蕪存菁的田園記憶與想像，歸返於「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的設想。從這個意義來說，僅僅存載了歸田之理想與幻想的〈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留給未來一旦後悔歸田的自己，以作為備忘或惕勵的。它不單是為了喜將歸田的近日而寫，也是為了歸田後或生脚蹩的更遠的來日而寫。〈歸去來兮辭〉中所述事件發生的時間是遊移的——以未然為已然，而參悟的時間也是遊移的——現在既已「悟今是而覺非」，以後亦不必「奚惆悵而獨悲」。

伍、結語：向隱逸譜系歸位

綜言之，陶淵明於壯年十餘載間嘗經「三出四處」之波蕩，而其以宦遊為主題或明確涉及宦遊履歷的詩賦，今遺十一。此諸作品再現了陶淵明透過若干修辭技巧與傳播策略，而在自身真實生涯的基礎上，適度編輯和變造成的出處記憶。作者向讀者開放的，是化合了原始生動的經驗、記憶，以及狀似原始生動的「經驗」口吻和「記憶」語態，而形成

的「記憶書寫」。諸作又可分出三種撰作的時間點，以及與此相應的三種呈現出處記憶的視野：

- 一、在標示撰於宦遊途中的作品裡，作者展示了如何在「前隱逸」（期待與預備再度退處）的視野下，既記敘宦遊又追念歸田，以經過正面化、簡化等變造程序的退處記憶，去評估當前的宦遊經驗（此「經驗」同樣遭到記憶書寫的轉化）。「前隱逸」之「前」，一則必須置於陶淵明作品內自標的「宦遊途中作」之「時態」（尚未退處）來理解，二則必須置於其作品內流露的「將欲退處」之「情態」來理解，三則必須置於其生平中「三出四處且終處」之「週期」來理解。
- 二、而在標示撰於歸田期間的作品裡，「前隱逸」則遞換為在「後仕宦」（厭倦再仕又暗感不安）的視野下，既記敘歸田又回憶宦遊，同樣是以經過負面化、簡化等變造程序的宦遊記憶，去釐定現有退處經驗（後者亦同為記憶書寫的一部份）的價值。「後仕宦」之「後」，一則必須置於陶淵明作品內自標的「歸田期間作」之「時態」（結束上次仕宦以後）來理解，二則必須置於其作品內流露的「學優則仕」意識型態延伸至歸田現狀而擾動其正當性（此意識型態成為某種「後座力」）這一「情態」來理解，三來必須辨明的是，此「『後仕宦』的焦慮不安」，並不意味著陶淵明在宦遊主題的作品中，曾明顯表現出「『前仕宦』的積極預備再仕傾向」。
- 三、至於在非出非處の間歇中所撰者，「前隱逸」之期待與「後仕宦」之不安則摺疊共存，但由於作者假借事實或記憶的「已然」外表，而巧妙地虛構出實則「未然」的「隱逸」結果，故此期待與不安又進一步被預先調停為無需期待或無需不安。藉由這些特殊的記憶書寫，陶淵明一再為個人的歸田意志提出聲明（statement），而且表達了向隱逸譜系歸位的趨同性。

顯然可見，這些以宦遊為主題的作品中，同時錯織著看似矛盾的歸田論述。實際上，無論置諸宦遊或歸田背景以觀，它們都既是宦遊詩，又是「前田園詩」。恰恰是在「宦遊」的框架中，才最有效地彰顯出「歸田」的尚未完成和值得完成，「宦遊」在地理上懸隔、迂遠、險譎的特徵，以及為宦者在心理上必須承擔的種種人事壓力乃至生命危險，加倍強化了「田園」終究更為怡然可親的印象或想像。不管是在宦遊途中憶述歸田，或是在歸田之後憶述宦遊，陶淵明都試圖藉著在作品中分立出一個作為「宦遊者」的「他者」，激生關於生命指歸的對話，從而完善與鞏固另一個希望成為「隱逸」的「自我」。儘管這所謂的他者、自我及其關係，皆來自作者（主體）的建構，並存於作者一身，然若無此一番擬態往復，我們不難想見，詩人對於一己的生命叩問和歷史形象的自畫，將減卻多少複雜微妙的可讀性！

對於將來的史傳是否載錄自己，或雖錄而能否完整精準，陶淵明似乎從無絕對的信心。因此，他援用了傳統上被認為具有「言志」、「詠懷」功能的詩體，作為另一種「自傳」，作為儼然可能入史而補史，甚至是「自為史」的預備。他以實質上極為複雜微妙的辯解，而欲向當時後世的廣大讀者證明一己的單純本性，及此純志偶或失軌蒙塵之所以然。以宦遊主題為例，透過記憶書寫的管道，他再再宣說自己雖歷宦遊時期，卻始終懷抱隱逸之志，一旦入歸田歲月，便能體踐之；坦承屢仕的行徑，而又強調情非得已。從這些辯解中，我們可以揣味的，不僅是陶淵明在周而復始的生命叩問中，朝向隱逸譜系「歸位」之艱楚，也包括了他以文字自畫時的誠實與退縮：既不欲否認屢出屢處的真實履歷，又極渴望平衡、修飾、開釋此履歷所可能導致的爭議性。文辭策略上的掙扎，其動人如是也。

如果說史家選擇了容忍、或乾脆無視於陶淵明在出處問題上存在過的矛盾，除了他辭彭澤令後確實躬耕以終此一大原因之外，我們或亦可從另一角度去思考：陶淵明以上述的記憶書寫，有意無意地設計了供後人理解、詮釋他的重要基本框架，引導史家和讀者去認知，即便「三出」，為宦也從來祇是他歸田生涯的前奏或插曲。⁵²他的努力或許多少奏效了：我們看到，追求典範的傳統史家，進一步刪節去這位隱逸傳主若干「不合入傳」的爭議片段，如〈歸去來兮辭〉序；至於往往依賴史家之歸類與描述而進行價值判斷的眾多讀者，亦傾向於相信陶氏的人與文之間並無本質上的衝突。

因此，頗為弔詭地，縱使「既隱且逸」對陶淵明來說，是一個橫亘其一生數十年的修養進行式，甚至在其生命結束之前，恐怕亦未在生理和心理上純徹地圓證「隱且逸」的理想；然而，後人卻每每尊之為隱逸典範，毫無疑問可列入隱逸譜系（但觀史家錄之於《晉書》、《宋書》及《南史》之〈隱逸傳〉或《蓮社高賢傳》等即可知），為百代以下任何嘗試知解隱逸或踵為隱逸的來者，提供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史實」例證。至若其詩文的若干形義風格創構及箇中「歸田園居」的概圖（schema），亦同樣成為後人對「隱逸」和「田園」的歷史記憶之一。從這個側面上，未嘗不顯示了歷史、記憶和書寫之間微妙的互涉與轉換。

⁵² 王國瓔亦嘗指出，陶詩「強調的主要是，自己如何與俗世不同，如何特立獨行，卻很少自我審視一己人格情性或思想觀念前後的轉變與演化」，以致於「讀者認識的，也正是一個堅持理想，拒絕妥協，始終如一，毫無成長變化，很容易歸類於『隱士』這種社會角色的典型人物形象。」王國瓔，〈陶淵明詩中「篇篇有我」——論陶詩的自傳意味〉，《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大中文系，2001年），頁323。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東晉 Dongjin · 陶淵明 Tao Yuanming 著，袁行霈 Yuan Xingpei 箋注，《陶淵明集箋注》*Tao Yuanming jijian z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3 年。
- 梁 Liang · 沈約 Shen Yue，《宋書》*Song shu*，臺北[Taipei]：鼎文書局[Dingwen shuju]，1998 年。
- 梁 Liang · 蕭統 Xiao Tong，《梁昭明太子文集》*Liang zhaoming taizi wenji*，見《四部備要》*Sibu beiyao*，上海[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49 年。
- 梁 Liang · 鍾嶸 Zhong Rong 著，汪中 Wang Zhong 注，《詩品注》*Shipin zhu*，臺北[Taipei]：正中書局 [Zhengzhong shuju]，1967 年。
- 唐 Tang · 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晉書》*Jin shu*，臺北[Taipei]：鼎文書局[Dingwen shuju]，2003 年。
- 唐 Tang · 李延壽 Li Yanshou，《南史》*Nan shi*，臺北[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97 年。
- 北宋 Bei Song · 晁補之 Chao Buzhi，《雞肋集》*Jile ji*，見影印本《文津閣四庫全書》*Wenjinge siku quanshu*，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 guan]，2006 年。
- 南宋 Nan Song · 葛立方 Ge Lifang，《韻語陽秋》*Yunyu yangqiu*，見《百部叢書集成》*Baibu congshu jicheng*，臺北[Taipe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 guan]，1967 年。

南宋 Nan Song · 葉夢得 Ye Mengde, 《石林詩話》 *Shilin shihua*, 《百部叢書集成》 *Baibu congshu jicheng*, 臺北[Taipei]: 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 guan], 1967 年。

元 Yuan · 劉履 Liu Lü, 《文選詩補注》 *Wenxuanshi Buzhu*, 上海[Shanghai]: 掃葉山房[Saoye Shanfang], 1921 年。

明 Ming · 鍾惺 Zhong Xing, 《古詩歸》 *Gushi gui*, 明萬曆丁巳年刊本。

清 Qing · 沈德潛 Shen Deqian, 《古詩源》 *Gushi yuan*, 光緒十七年思賢書局重刊本。

清 Qing · 溫汝能 Wen Runeng, 《陶詩彙評》 *Taoshi huiping*, 上海[Shanghai]: 掃葉山房[Saoye Shanfang], 1928 年。

清 Qing · 陶澍 Tao Shu 集注, 《靖節先生集》 *Jingjie xiansheng ji*, 原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二) 近人編輯、論著

王叔岷 Wang Shumin, 《陶淵明詩箋證稿》 *Tao Yuanming shijian zheng gao*, 臺北[Taipei]: 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 1965 年。

王明珂 Wang Mingke,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Huaxia bianyuan lishi jiyi yu zuqun rentong*, 臺北[Taipei]: 允晨出版社[Yunchen chubanshe], 2005 年。

王國瓊 Wang Guoying, 〈陶淵明詩中「篇篇有我」——論陶詩的自傳意味〉“Tao Yuanming shizhong ‘pianpian youwo’: lun Taoshi de zizhuan yiwei”, 《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 *Wang Shumin xiansheng xueshu chengjiu yu xinchuan yantaohui lunwen ji*, 臺北[Taipei]: 臺大中文系[Taida zhongwenxi], 頁 299-323, 2001 年。

- ，《古今詩人隱逸之宗——陶淵明論析》*Gujin shiren yinyi jih zong Tao Yuanming lunsì*，臺北[Taipei]：允晨出版社[Yunchen chubanshe]，2009年。
- 北大中文系 Beida zhongwenxi，北師大中文系 Beishida zhongwenxi 編，《陶淵明資料彙編》*Tao Yuanming ziliao huibian*，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5年。
- 田曉菲 Tian Xiaofei，《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Chenjilu: Tao Yuanming yu shouchaoben wenhua yanji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7年。
- 許尤娜 Xu Youna，《魏晉隱逸思想及其美學涵義》*Weijin yinnyi sixiang jiqi meixue hanyi*，臺北[Taipei]：文津出版社[Wenjin chubanshe]，2001年。
- 許東海 Xu Donghai，〈歸返、夢幻、焦慮：從陶、柳辭賦論歸田書寫的文類流變及其創作意蘊〉“Guifan, menghuan, jiaolü: cong Tao, Liu cifu lun guitian shuxie de wenlei liubian jiqi chuanguo yiyun”，《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22期1[vol. 22, no. 1]，2004年6月，頁47-80。
- 孫康宜 Sun Kangyi，《文學的聲音》*Wenxue de shengyin*，臺北[Taipei]：三民書局[Sanmin shuju]，2001年。
- 遼欽立 Lu Qinli 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Xianqinhan weijin nanbei chao shi*，[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83年。
- 張法 Zhang Fa，《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Zhongxi meixue yu wenhua jingshen*，臺北[Taipei]：淑馨出版社[Shuxin chubanshe]，1998年。
- 楊勇 Yang Yong，《陶淵明年譜彙訂》*Tao Yuanmang nianpu huiding*，香港[Hongkong]：新亞學報[Xinya xuebao]7期1[vol. 7, no. 1]，1965年。
- 葛兆光 Ge Zhaoguang，《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札記》*Hanzi de mofang: zhongguo gudian shige yuyanxue zhaji*，上海[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Fudan daxue chubanshe]，2008年。

- 齊益壽 Qi Yishou,〈陶淵明的宦遊詩〉“Tao Yuanming de huanyou shi”,《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Mao Zishui xiansheng jiuwu shouqing lunwen ji*,臺北[Taipei]:幼獅出版社[Youshi chubanshe],頁 205-226, 1987 年
- 鄭毓瑜 Zheng Yuyu,《六朝情境美學》*Liuchao qingjing meixue*,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Liren shuju],1997 年。
- 蔡瑜 Cai Yu,〈從飲酒到自然——以陶詩為核心的探討〉“Cong yinjiu dao ziran: yi Taoshi wei hexin de tantao”,《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2005 年 6 月,頁 223-268。
- 劉康 Liu Kang,《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Duihua de xuansheng: Baheting wenhua lilun shuping*,臺北[Taipei]:麥田出版社[Maitian chubanshe],2005 年。
- 顏崑陽 Yan Kunyang,《六朝文學觀念叢論》*Liuchao wenxue guannian conglun*,臺北[Taipei]:正中書局[Zhengzhong shuju],1993 年。
- 川合康三 Kawai Kozo 著,林欣慧 Lin Xinhui 譯,〈從空間移動視點探討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並序要旨〉“Cong kongjian yidong shidian tantao Tao Yuanming de guiqu laixi ci”,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Kongjian yu wenhua changyu: kongjian yidong zhi wenhua quanshi*,臺北[Taipei]:漢學研究中心[Hanxue yanjiu zhongxin],2009 年。
-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著,陳濤 Chen Tao 譯,《歷史的用途與濫用》*Lishi de yongtu yu lanyong*,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00 年)
- 霍伊 D.C. Hoy 著,蘭金仁 Lan Jinren 譯,《批評的循環》*Piping de xunhuan*,瀋陽[Shenyang]:遼寧人民出版社[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1987 年。

-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鄭學勤 Zheng Xueqin 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Zhuiyi: zhongguo gudian wenxue zhong de wangshi zaixian*，臺北[Taipei]：聯經出版社[Lianjing chubanshe]，2006 年。
- 艾德華·薩依德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 Dan Dexing 譯，《知識份子論》*Zhishi fenzi lun*，臺北[Taipei]：麥田出版社[Maitian Chubanshe]，1997 年。
- 羅伯·索科羅斯基 Robert Sokolowski 著，李維倫 Li Weilun 譯《現象學十四講》*Xianxiangxue shisi jiang*，臺北[Taipei]：心靈工坊[Xinling gongfang]，2004 年。
- 亨利·伯格森 Henri Bergson 著，肖聿 Xiao Yu 譯，《材料與記憶》*Cailiao yu jiyi*，北京[Beijing]：華夏出版社[Huaxia chubanshe]，1999 年。
- 亨利·伯格森 Henri Bergson 著，吳士棟 Wu Shidong 譯，《時間與自由意志》*Shijian yu ziyou yizhi*，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2007 年。
- 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 Bi Ran 等譯，《論集體記憶》*Lun jiti jiyi*，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02 年。
- 哈拉爾德·威爾策 Harald Welzer 著，季斌 Ji Bin 等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Shehui jiyi: lishi, huiyi, chuancheng*，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7 年。
- Bakhtin, M.M. "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tic Activity." In *Art and Answerability: Early Philosophical Essays*, edited by Michael Lovich Holquist and Vadim Liapunov, 4-256.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 Guillory, John. "Canon." 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ited by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233-249.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Megill, Allan.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Owen, Stephen. "The Self's Perfect Mirror: Poetry as AutoBiography." In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edited by Sheun-fu Lin and Stephen Owen, 71-10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